



# 武夷山朱熹及其理学遗迹考



赵爱玉

(福建武夷山市博物馆)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翁,祖籍江西婺源,出生在福建尤溪,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宋史·朱熹传》载:朱熹“中绍兴十八年进士第”、“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家故贫,少依父友刘子羽,寓建之崇安,后徙建阳之考亭,箪瓢屡空,晏如也”。建之崇安,系宋代闽北建州(南宋时升为建宁府)辖下的崇安县,即今之武夷山市,为中国东南自然形胜与文化名山武夷山之所在。从《朱熹年谱》看,朱熹徙居建阳考亭系晚年之事,此前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武夷山渡过的,在这里他博览群书,成家立业;他倡建社仓,减少民间疾苦;他营建精舍,读书论道,聚众讲学,与武夷山结下了密切的不解之缘,留下了不少相关的文物史迹。本篇就武夷山朱熹及其理学主要遗迹予以考论(图见彩版三),请方家学者批评指正。

## 一. 刘子羽神道碑

该碑全称为“宋故右朝议大夫充徽猷阁待制赠少傅刘公神道碑”,立于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十月。

碑文为朱熹撰书,由当时著名学者张栻篆额,全文长达3725字,碑面已有小部分损坏、尚存3200多字,是现存朱熹撰书碑刻中内容最完整、字数最多的碑刻。碑材为花岗岩,圆首长方形,通高3.7米,宽1.46米,座高0.23米,厚0.1米。原来竖立在五夫镇拱辰山蟹坑刘子羽墓前,于1981年移至武夷宫中山堂珍藏。

碑文志铭的墓主刘子羽,崇安五夫里人,是南宋名臣和抗金名将,朱熹父朱松之友。碑文主要记载了刘子羽的生平事迹,较之《宋史·刘子羽传》更为详尽。碑文亦述:“熹之先人晚从公游,相好也,不幸属疾,寓书以家事为寄,公惻然怜之,收教熹如子侄,故熹自幼得拜公左右,然已不及见公履戎开府时事,公又未尝以其功伐语人,独见其居家接人,孝有乐易,开心见诚,豁然无纤芥滞吝意,好贤乐善,轻财喜施,于姻亲旧故贫困困厄之际,尤孜孜焉”。《宋史·刘子羽传》亦称:“吏部郎朱松以子熹托子羽,子羽与弟子翬笃教之,异时卒为大儒云”;说明朱松生前托孤于子羽,受到刘氏弟兄鼎力相助。朱松托孤和朱熹受教的还有崇安名儒刘子翬、刘勉之、胡宪等人,俱见《宋史》列传,

兹列于下:

刘子翬,号屏山先生,传云:“与籍溪胡宪、白水刘勉之交相得,每见,讲学外无杂言。它所与游,皆海内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远者,惟新安朱熹而已。初熹父松且死,以熹托子翬。及熹请益,子翬告以《易》之‘不远复’三言,俾佩之终身,熹后卒为儒宗”。

刘勉之,号白水先生,传云:“其友朱松卒,属以后事,且戒其子熹受学。勉之经理其家,而诲熹如子侄。熹之得道,自勉之始”。

胡宪,号籍溪先生,传云:“松将没,属其子熹受学于宪与勉之、子翬。熹自谓从三君子游,而事籍溪先生为久”。

以刘子羽神道碑文与《宋史》记载相印证,少年朱熹受到父亲生前好友刘子羽、刘子翬、刘勉之、胡宪诸人的器重和教育,得益匪浅。刘、胡诸人俱是武夷山一带的大族和名士,处世气节、为人品德和学问造诣,俱对朱熹产生了重大影响。朱熹能够长期居家生活于武夷山,而且成长为理学大师,实有深厚之渊源。

## 二. 读书讲学遗址

### 1. 紫阳书堂

位于武夷山市五夫镇府前村,是刘子羽为朱熹建造的居室。地处群峰叠翠的屏山脚下,碧波荡漾的潭溪之滨,环境清幽,气候宜人。此事载于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记录:“初,文公之父韦斋疾革,手自为书,以家事属少傅。韦斋歿,文公年十四,少傅为筑室于其里,俾奉母居焉。少傅手书与白水刘致中云:‘于绯侯得屋五间,器用完备。又于七仓前得地,可以树,有圃可蔬,有池可鱼。朱家人口不多,可以居’。朱熹《名堂室记》亦谓:紫阳书室之名缘于祖籍地紫阳山,“山在徽州城南五里,尝有隐君子居焉。今其上有老子祠。先君子故家婺源,少而学于郡学,因往游而乐之。既来闽中,思之独不置,故尝以紫阳书室者记得其印章,盖其意至未尝一日忘归也。既而卒,不能归,将歿,始命其孤熹来居潭溪之上,今三十年矣。贫病苟活,既不能返其故乡,又不能大其阊门以奉先祀。然不敢忘先君之志,敬以印章的刻篆其所居之厅事,庶几所谓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者,后世犹有考焉”;“堂傍两夹室,暇日默坐读书

其间,名其左曰敬斋,右曰义斋。盖熹尝读易得其两言,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以为为学之要,无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乃读之庸,见其所论修道之教,而必以戒,谨恐惧为始,然后得夫所以持教之本;又读大学,见其所论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为先,然后得夫所以明义之端。既而观夫二者之功,一动一静,交相为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极之论,然后又知天下之理,幽明巨细,远近深浅,无不贯乎一者,乐而玩之,固足以终吾身而不献,又何暇乎外慕哉?”

这些记载说明,朱松、朱熹父子生平皆贫困,经常怀念故乡风物。少年朱熹在父亲过世家境陷入潦倒之时,受到刘子羽的资助,在武夷山附近五夫里建造了住宅,居室之名是为了纪念祖籍地婺源源的紫阳山得名。住宅有堂有室,是朱熹读书的理想之处,在此读大学、中庸等儒学经典,孜孜不倦,为日后之大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紫阳书堂经历代修建,于民国初年毁于兵燹,仅存遗址。1998年在原址上重建紫阳楼,占地551平方米,建筑面积654平方米,仿宋代建筑风格,构体为歇山顶的闽北民居格式,内中的厅、堂、室、斋、轩基本格局遵循朱熹自撰的《名堂室记》,厅堂左室为“敬斋”,取怀念之父朱松(号韦斋)之意;右室为“义斋”,为恭迎父辈和接待来访学友的下榻之所。朱熹重礼仪,曾两度在紫阳楼迎迓延平之师李侗和浙江学者吕祖谦,在义斋留下互相论道的胜迹。后堂命名为“晦堂”,深寓恩师刘子翥谆谆教诲的修身道理。堂前高悬一副朱熹手书的恩师赠联:“木晦于根,春容晬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意即应遵循古训:韬晦深藏,敛性修身,潜心苦读,创业成才。横匾“不远复”是朱熹手书恩师所赠的“三字符”(符意即格言),表达了迷途不远之时,即应回复知返的儒家修养方法。赠联和赠匾都成了朱熹一生遵循的座右铭,而恩师为朱熹择取的表字就叫“仲晦”,“晦”的深意镌于堂匾,使朱熹一生铭刻在心。

南宋绍熙三年(1192年),65岁的老年朱熹受谗于奸佞之臣,被迫辞拜五夫家祠,南迁建阳考亭,但他仍时刻心系五夫,还恋恋不忘此处旧居,他在《怀潭溪旧居》诗里写道:“忆住潭溪四十年,好峰无数列窗前,虽非水抱山环地,却是冬温夏冷天。绕舍扶疏千个竹,傍崖寒冽一泓泉。谁教失计东迁谪,卧卧西窗日满川”。

## 2. 武夷精舍遗址

座落于武夷山风景区隐屏峰下,是朱熹在南宋淳熙十年(1183年)亲自擘划、营建的书院。朱熹在《武夷精舍杂咏诗序》记其事:“直屏下两麓相抱之中,西南向为屋三间者,仁智堂也。堂左右两室:左曰‘隐求’,以待栖息;右曰‘止宿’,以延宾友。左麓之外,复前引而右抱,中又自为一坞,因累石以门之,而命曰‘石门之坞’。别为屋,其中以俟学者之群居,而取‘学记相观而善’之义,命之曰‘观善之斋’。石门之西西南又为屋,以居道流,取道书《真诰》中语,命之曰‘寒栖之馆’。直观善前山之巔为亭,回望大隐

屏最正且尽,取杜子美诗语,名以‘晚对’。其东出山背临溪水,因故基为亭,取胡公语,名以‘铁笛’,说具本诗注中。寒栖之外,乃植援到樊,以断两麓之口,掩以柴扉,而以武夷精舍之匾揭焉”。

此后朱熹就在此著书立说,聚徒讲学。曾经名噪一时的理学家,如蔡元定、游九言、刘翬、黄干、詹体仁、真德秀、李閼祖、李方子、叶味道等人都受业于朱熹门下。在南宋时期,武夷山俨然成为祖国东南的文化名山,被称为“道南理窟”。时人韩元吉《武夷精舍记》称道:朱熹“躬画其处,中以为堂,旁以为斋,高以为亭,密以为室,讲书、肄业、琴歌、酒赋,莫不在是”,而且“暇则游焉。与其门生弟子挟书而诵,取古诗三百篇及楚之词,哦而歌之,潇洒啸咏,留必数日,盖山中乐悉为元晦之私也”。

南宋末,武夷精舍经扩建后改名为紫阳书院。元时毁于兵燹。到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朱熹八世孙朱洵、朱澍出资重建,改称“朱文公祠”。清康熙年间,朝廷赐予“学达性天”的匾额,再加创修。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闽浙总督觉罗满保“捐俸倡修”。“文化大革命”中正堂拆除改建礼堂,后仅存两虎偏舍,破损不堪。2000年在原址重建“武夷书院”。

## 三. 五夫社仓遗迹

五夫社仓,座落在崇安五夫里籍溪坊(今五夫镇兴贤街)之凤凰巷内。初建于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为朱熹首创并命名的一个民办社仓。因社仓之址座落在崇安县五夫里,因而得名。邑人为了纪念先贤朱熹这个惠民善举,遂又称之为朱子社仓。五夫社仓竣工后,朱熹曾亲撰《崇安县五夫社仓记》一文,追溯并记述创建社仓的缘由。其文略曰: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闽北一带水旱频仍,饿殍满道,但是州县官仓和地方富豪囤粮居奇,不肯救济灾民,境内“动相贼杀,以至挺变”,再次酝酿着事变的危机。当时,朱熹正在崇安居住,面对满目疮痍,他不忍坐视,于是劝说崇安五夫里富户发藏粟,继而诸县衙开仓,除赈灾民。并提请建立社仓制度,先后三次上书建州知府,陈述州县官仓之弊,各述建立社仓的好处。认为州县官仓“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视民之殍而不肯发,往往全其封疆递相付授,至或累数十年不省,一旦甚不获已,然后发之,则已化为浮埃聚坏而不可食矣”。而“山谷细民无盖藏之积”,青黄不接时要出加倍利息,向豪强地主借贷粮食,使官仓置于无用之地。因此,他主张在乡村里就地设仓,“既舒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凡是要借贷粮食的农民,都由官府就地借给,农民出十分之二的轻息,不愿借贷的,决不勉强,若遇饥荒,要减轻利息,甚至全免,“予以惠活鳏寡,塞祸乱源,甚大惠也”。

乾道七年(1171年),建州知府批准了朱熹的建议,在崇安五夫建筑社仓,“命以钱六万助其役”,于是“鸠工度材”,“仓之庶事,细大各有程,可久而不败矣”。厥后不久,

(下转第149页)

详尽考古记录中分辨社会复杂化的经济基础中就经常被指出存在这些问题,克里斯廷森强调,需要对隐藏在差别明显的考古序列背后的结构原则加以规律总结来解决这些问题。

研讨会所得出的综合基本上是有说服力的,因为它认识到了社会中权力和控制来源的极端复杂性和相互依存性,以及始终威胁着社会瓦解的不稳定性和分裂力量的存在。酋邦的长时段轮回特别令人瞩目,它形成了局部和区域扩张和崩溃(衰退)的各种方式。

达成共识的基础是,酋邦必须被理解为一种政治系统。要做到这点,注意力必须放在政治权力上,以及它是如何产生又如何控制的。为此特别重要的是,维生经济是如何被转而用来为酋邦形成中的区域机构提供财政支持。对政治经济的控制,又通过结合使用军事手段和意识形态活动来维持的。征集的部分剩余产品,可以被用于发展经济基础,以及供养保卫和征服土地的武士阶级,也会被用于确立统治

者合法性的礼仪上。经济控制、军事力量和礼仪合法性的结合在本书的案例中是一个反复论及的话题。酋邦所依赖的控制存在多种选择,但这些选择并非毫无限制,其稳定性和发展潜力也并不相同。选择范围取决于环境、技术和个案历史的特定条件;其结果则因演化发展的速度和程度而差异极大。对酋邦政治进程与其权力和控制各种可行选择密切相关这一认识,慢慢把我们引向阐明主导社会复杂化演进的各种特点。

注释:

① 限制(circumscription):是指在某区域中的社群由于受地理环境、周边社群或资源条件的限制而在人口压力和冲突加剧的情况下无法逃离,不得不以降低生活条件和丧失自由为代价而留在这个区域内的一种状况。详见卡内罗的《国家起源的理论》。——译者注。

(上接第180页)

崇安县境增扩社仓凡十七所。淳熙八年(1181年)农历十一月己亥日,朱熹奏事延和殿,条陈七事,其四请颁行社仓条约于诸路。农历十二月宋王朝以朱熹社仓法下于诸路。朱熹倡导的社仓制度,被誉为“先儒经济盛迹”,不啻是一种改良措施,对暂时缓和阶级矛盾和封建统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社仓历代重修不辍,因而保存完好。最后一次修建于清光绪十五年,由朱熹裔孙乡绅朱敬熙主其事。社仓大门外的匾额为“五夫社仓”四个砖雕大字,上款为“光绪己丑仲夏吉立”,下款为“花翎郎中朱敬熙建”。大门内为院落,供挑粮者歇脚休息,约30余平方米。二门匾额为“朱子社仓”四个砖雕大字,上下款分别为“光绪乙丑仲夏”和“裔孙朱敬熙建”。二门内即为粮仓,左右并列仓廩,可容存粮六七十万千,两侧仓廩之中有宽敞通道,便于农民装粮俗时过秤记账。仓廩后面设有仓管人员宿舍。社仓面积约1400余平方米。社仓的廩票仍为五夫镇粮站存粮之用。

除上述主要者,朱熹及其理学在武夷山的遗迹还有屏山书院,兴贤书院,朱子巷等等,如今皆列入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理学研究的学术园地和海内外游客向慕的胜境。故当代学者蔡尚思有评价说:“东周出孔子,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

注释: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百二十九,第12751~12770页,中华书局,1985年。

《宋史》卷三百七十,第11504~11509页,中华书局,1985年。

同上书卷四百三十四,第12871~12872页。

同上书卷四百五十九,第13462~13463页。

同上书卷四百五十九,第13463~13465页。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二,《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朱子全集》《名堂室记》,引自武夷山朱吉普研究中心编《武夷胜境理学遗迹考》,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

《朱文公全集》卷九,引自同上书第161页。

(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卷之十·五曲,方志出版社,1997年。

a.同上书第304~305页。

b.《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七,引自《武夷胜境理学遗迹考》167~169页。

c.民国《崇安县新志》卷十·政治

(责任编辑:渊 慧)



# 武夷山朱熹理学遗迹



紫阳楼



五夫社仓



朱子故居



神道碑



武夷书院